

刺桐探麗錄

许在全 著



红旗出版社

刺桐探史
故園抒懷

盧嘉錫題



(京)新登字108号

刺 桐 探 骊 录

作 者 许在全
责任编辑 高晨野
出 版 红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北街2号) 邮政编码 100727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排 版 泉州晚报社出版部
印 刷 泉州晚报社印刷厂
开 本 145×211毫米 大32开本 9.75印张 226千字
1993年5月第一版 199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068-537-3 / K·20
定 价 18元

目 录

序言	1
自序	4
毛泽东论中国文化	9
马克思与近代中国	26
马克思与近代华工	39
华侨的爱国主义思想	45
福建沿海治略考	59
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80
泉州吏治与海上丝绸之路	97
泉州市舶司与海上丝绸之路	102
泉州海商与海上丝绸之路	107
泉州民族与海上丝绸之路	112
泉州宗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122
泉州陶瓷与海上丝绸之路	128
泉州名胜与海上丝绸之路	131
南宋泉州郡守的智慧之光	136
山川不朽仗英雄	141
龙虎榜进士欧阳詹	143

许稷与“赐恩传芳”	147
泉州“三苏”	150
泉州“三曾”	157
才兼文武吕惠卿	168
状元拜相梁克家	174
赵宋宗室骄子赵令衿与赵汝适	179
理学家蔡清与反理学家李贽	184
布衣诗人黄克晦	192
文坛领袖王慎中	195
艺术大师何朝宗	199
方志学家何乔远	203
“第一通”与“进士头”	206
抗倭名将俞大猷与民族英雄郑成功	211
南天铜柱施琅	219
近代科技先驱丁拱辰	224
百哀状元吴鲁	227
 让中华民族文化永放光辉	 231
闽中学派与朱熹学派	235
中华文化与中国拳术	245
中国木偶艺术探源	250
严羽与《沧浪诗话》	254
梁披云与《雪庐诗稿》	260
诗·诗乡·诗星	266
尊师必须重道	269

杨震与“四知传芳”	272
开展华文教育与弘扬中华文化	275
研究和加强家庭教育	278
寄语《泉州文学》	283
写在刺桐花开时节	285
《青春风韵》序	288
晋江石刀山摩尼之迷	290
走访永春夹漈村	294
闽西土楼与客家风采	297

序 言

春的信息告诉人们，只要珍惜春光，精心播种，勤于耕耘，就会有收获。许在全继《温陵折柳录》出版之后，《刺桐探骊录》又要问世了。我知道他担负着许多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日常事务很多很忙。但是，在工作之余，他仍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地进行探史，借史抒发自己的情怀，以服务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这是令人高兴的。

记得《温陵折柳录》出版之时，我曾以《刺桐探史，故园抒怀》为题，撰写一文，作为该书的序言。事隔不到两年，他竟又洋洋大观地拿出一部《刺桐探骊录》新著来，可见他用心之专，用思之精，用力之勤。如果从这两部著作比较看来，虽同样大都取材于史，但各具特色。如果说，《温陵折柳录》是以史会友，突出的是一个“抒”字，借写家乡的历史，抒发对家乡的爱恋之情，表达折柳赠友的诚挚之心。那么，《刺桐探骊录》则是以史为鉴，突出的是一个“探”字。在熟悉家乡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考察和总结家乡发展的历史，从中找到借镜，以促进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因此，他这部新著更有深度，更有学术性。可以看出，在史学研究方面，他已经向前迈进一步。

《刺桐探骊录》，收录许在全的力作四十八篇。开篇《毛泽东论中国文化》，是作者多年学习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总结，是他结合自己工作、学习的心得体会的结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的文化思想。《马克思与近代中国》和《马克思与近代华工》这两篇文章，是作者独特用心之处。通常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比较注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作者却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前，探讨马克思与中国的关系；通常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比较注意研究马克思与工农的关系，很少把眼光放在华侨身上。可是，作者却匠心独运，在大量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注意马克思关于中国华侨的论述，关心华侨发展之命运。可谓难得。这部新著的重心，主要是放在泉州港的兴盛发展史上，着力探讨它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其中十篇文章，从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相当集中地对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个热题上进行探索。虽然写过这方面文章的人不少，但是，如此全面、系统、集中地论述还不多见。在史学这个海洋里，可以看出，作者是以一个探索者的身份，扬帆远航，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追求搜寻；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作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徜徉在史学的海洋里，投入大量心血地探寻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他力图以雄辩的历史事实，鼓动泉州重振海上雄风。另一重点，是一组写泉州历史人物的文章。这是作者在主编《泉州历史人物传》一书之后，犹感心意未尽，于是，撷取其中的精华之精华，重新编纂。这一部分文章，虽然在史料方面，没有超出原书的内容，但是，他用专精之思，传神之笔，择其典型人物加以评述，有重点地介绍泉州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从更深一层次地揭示“山川不朽仗英雄”这一主题。这不仅反映出作者对家乡和家乡人物的深沉之爱，而且反映作者的另一番用心，就是借着这些乡贤才俊，用

以教育子孙后代,激励他们更加奋发向上,为祖国为家乡争取更大的荣光。最后一组的文章,虽然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都关系到文化的问题,可以看出,作者用心仍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从这些文章来看,也可以看出文章短小精悍,反映作者工作和生活近况。由于他的工作较忙,不能从事长篇宏论著述,所以,只能挤出一些时间,写些短文。这些文章的风格,带有浓厚的散文倾向,可见作者著述,已经从历史论文逐渐向历史散文方面过渡,这也是作者近年来一个新的探索:怎样利用工作之余,运用手中的笔,继续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服务。

许在全一向坚持这样一个信条:即“以史为鉴,以文会友,以史传情,以情感人”。从《温陵折柳录》到《刺桐探骊录》成书的过程,我认为,他基本上是实现了自己的信诺。《刺桐探骊录》,旨在“探骊”。“骊”,即骊龙,传说中的黑色的龙。我们中国有两个成语,“探骊觅珠”,“探骊得珠”。不管是“觅珠”或者“得珠”,都是辛苦艰险的。因为“骊”是居于万丈深潭之中,而珠又藏于黑龙的下颌之下,当然“觅”和“得”都是极不容易的。作者以此作为书名,是寓有自己的深意的。有的人说,要担负行政工作就不要从事研究工作,要搞研究工作,就不要担任行政工作,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不可得兼。其实,这种把两者对立起来的看法未免失之偏颇。中国有句老话:“有为方能有位,有位更能有为。”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努力奋斗,便会有所作为,有所作为就有你的地位,有了一定的地位,只要你不固步自封,一定的地位还会促使你更有作为。有为有位,有位有为,这两者可以相互砥砺,更可以相得益彰。我寄望本书作者和一切朋友,趁此明媚的春天,努力开拓前进,奋发有为!

苏双碧

1993年春于北京沙滩

自序

1985年秋，我离开从事学习和工作30年的福建师范大学，回到故乡泉州工作。虽然是回到了自己的摇篮之地，但是，我仍然感到陌生。因为我从小外出求学，从未走出校门，直至大学毕业之后，仍然留在大学工作。所以，来到泉州，只能说初出茅庐，进入一个广阔的新的天地，也可以说，又进入一所新的综合性的社会大学。泉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号称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现在，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着近六百万的乡亲，从这里走向五洲四海的有六百万同胞，还有从这里东渡，移居台湾繁衍数十代的上千万的台湾同胞。花锦山川，人文荟萃，是一个可爱的家乡。改革开放以来，这片土地生机盎然，蓬勃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这一新的环境，我这样扪心自问：象我这样一个书生，能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又转念一想：人有高低，才有大小，家乡象母亲一样，是不会嫌弃笨拙的儿女的。于是，我重新汲取家乡的雨露和乳汁，加强了自信，走上新的征程。

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自我感觉是：天赋不高，人尚努力；勤奋、真诚、执着。在我的心中，树立着三座心碑。一是，刚进

初中，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国文教师周梓材先生送给我一个条幅，题上“人生好比霜中菜，未历严寒味不甘”，我一直铭刻在心，去迎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二是，我在集美中学上高中时，当时陈嘉庚先生还健在，他经常教导我们“诚毅二字中心藏”，即待人以诚，办事以毅，这一直作为我的为人处世的准则。三是，在大学时代，黄寿祺教授教我们的古典文学，当他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时，在课堂里深情地恸哭了起来。当时，我们还不明其故。他说：读《出师表》不哭不忠，读《陈情表》不哭不孝。他的这一表现，给我的印象很深，思想影响很大。因为我们深知恩师的为人从不故弄玄虚，都是表里合一的。他决不是故作姿态做给我们学生看，而是出自他的真诚，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从此，我抱定决心，毕业之后，一定要报效祖国，报答父母，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一崇高信念，一直激励着我前进，不管碰到任何困难或者受到任何挫折，我都百折不回，毫不动摇。我想：在新的工作环境里，只要我这三座心碑不倒，仍然能够不断的进步，作出贡献。因此，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仅要努力工作，而且要把一生积累的知识贡献出来。于是，我一方面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一方面利用工作之余，以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为园圃，辛勤劳作，精心耕耘，希望在这片富饶的文化园地里，结出丰硕的果实，来奉献给我的父母之邦和我的亲爱的祖国。于是，在工作之余，一直默默地在这史海里进行探寻。

“学然后知不足”。当我完成《温陵折柳录》一书之后，虽对故乡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仍感不足。因为，有许多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仍然困惑着我。于是，我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在进行《刺桐探骊录》写作之时，我知道这是一个艰苦的历程。因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奋斗中锻炼出来的”，要从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中寻出新的正确的答案，决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所以，我便采取以“探”为主，既不在于搜新猎奇，也不在于加多史料，而是在于求知求实，从史实之中找到借镜。为达到这一目的，我这样要求自己，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由于我研究的对象是历史文化名城，所以我就要求自己要有正确的文化思想。基于这个想法，我便广泛地搜集和涉猎毛泽东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反复地进行学习和研究，从中汲取教益，以便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希望自己能够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俯瞰历史文化名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以便求得一个较为正确的见解。

泉州是祖国东南的沿海城市，她的兴衰更替，同沿海治略的得失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通塞是分不开的。为探明这个问题，我便对历代福建沿海治理的得失进行一番纵的考察。从对历代沿海治略的考察中，我发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就是泉州港的兴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通塞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丝路”畅通，泉州港就发展兴盛，“丝路”阻塞，泉州港就衰落萎缩。因此，我又对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进行横的考察。通过历史的条分缕析，宋元之际的泉州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大港口，确实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开放促进振兴，闭关阻碍发展。

泉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一方赖以生息的热土。宋元时期，泉州大港的地位尽管降落了，但她仍然继续发展。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可见，她不仅仅是重要的地理因素，更重要的是人，是人的因素。翻开泉州的历史，我们便可以看到这个地区人才彬彬而出。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这方热土中，孕育出许多优秀的儿女。在这里，我要感谢《泉州历史人物传》的作者，他们为我提供了100位泉州历史人物。在这灿若星河的人物群中，我逐一进行揣摩、比较，穷究每一人物的不同人生，于是，使我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山川不朽仗英雄”。泉州之所以保持经久不衰，不断

发展,就是因为她不断孕育出许许多多的优秀儿女。在这一组的文章中,我不敢说有提供什么新的史料,也不敢说对历史有什么新的发现,但它确实令我深入地进行思索,从中发掘泉州人的积极因素,揭示出“山川不朽仗英雄”这一主题。

泉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的问题,一直是最关心的问题。这里有丰厚的文化积淀,需要挖掘、整理、继承、创新。但是,要让中华民族文化放射光芒,仍然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所以,在本书中对文化问题也作一些探索。

“文章身外事,甘苦寸心知”,本书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除了本人作出一定的努力外,还得到诸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本书初稿完成之后,曾借着上京之便,我拜访了红旗出版社,向他们表明出版本书的意愿,并送上书稿。他们阅后不但不嫌我的浅薄,而且给我积极的鼓励,明确表示,同意给我出版。在这里,我应该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当我出书的喜讯传开之后,又受到海内外挚友不断的鞭策,特别是洪炳坤、许美智、王金钩、周玉聪、曾福应、蔡新国、王松龄、蔡济赏、柯秀琴、施振谋、曾焕锐、曾碧霜诸位同窗契友大力的支持与鼓励,在此深表谢忱。按原计划,两年前已经脱稿,本可付梓刊行。可是,越是受到出版社和朋友们的重视,我越感不安,觉得不能草率从事。文章固然是个人之作,但毕竟是社会的一笔财富,丝毫马虎不得。因此,我又利用业余的点滴时间,精心地进行修改,经过三番五次的改易,最后才定下这部稿子。在这易稿的过程中,我还要感谢泉州晚报社的电脑照排工人朋友,他们不厌其烦,为我修改澄清文字。所以,这部《刺桐探骊录》,与其说是我个人之作,倒不如说是集体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特别荣幸的是本书临出版之前,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卢嘉锡教授的题辞,全国政协常委、澳门归国华侨联谊会

主席、教育家、书法家、诗人梁披云老先生题写封面，著名历史学家苏双碧写序，著名画家刘兴森设计封面，在此一一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并诚挚地向广大读者致意。

许在全

1993年春于中国泉州

毛泽东论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向来以其历史悠久、辉煌灿烂而著称于世。我们中国人民为有这一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为继承和发扬这一份光辉的历史文化遗产，以保持我们祖国在世界上的先进文明的地位，他们呕心沥血、前仆后继，使中国文化不断放出光辉异彩！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更具体地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文化的性质、特点和作用、社会地位，以及其发展的方向道路，都没有被哪一位先哲或名贤正确而科学地阐明过。只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毛泽东，他以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以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文化作了科学的总结和论述。

漫长悠久的历史，它所产生的文化，同样走过一段相当曲折而复杂的过程。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形态，都各不相同。自周秦以来，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都处于封建社会，中国文化始终都未能摆脱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桎梏，因而发展的进程是缓慢的。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封建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曾经出现过隆盛的文化，为我国奠定比较雄厚的文化基础，在世界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可是，自宋以后，经过元、

明、清各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封建统治阶级走向腐朽、没落,中国文化的发展明显地受到影响。在这个时期,虽然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人物和优秀的文化,但从总的说来,发展的速度是缓慢下来了,甚至远远地落在世界的后头。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在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侵略的同时,也进行了文化的侵略。因此,在中国的社会里,除了反映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的文化外,又加上了反映帝国主义政治和帝国主义经济的文化。而这两种的反动文化又结成了“神圣同盟”,更为严重地阻碍和影响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文化至此断线了。作为人民的文化,它仍然要继续发展。但毕竟是生长在巨石的夹缝之中的幼花嫩草,不能发展成为参天大树。这时期的优秀文化,严格来说,仍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只有五四运动,掀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页,尽管社会性质还没有根本的转变,但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得到了新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毛泽东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总结,这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对于这一功绩,我们首先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

毛泽东对于中国文化有个正确的态度,这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① 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

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①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处于病态的旧中国，疮痍满目。毛泽东能够把改造社会与改革文化结合起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无疑地，这种思想和态度是正确的。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文化的正确的代表。这种思想和态度，直到现在，无疑地，仍然是正确的需要的。我们的祖国虽然已经“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了，但是，我们今天又有更高更新的战略目标，这就是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实现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远未完成，我们应该继续为之努力奋斗。因此，我们必须向毛泽东学习这种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革命而奋斗的精神。

对于中国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毛泽东作了正确的科学的精辟论述。他有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② 这是毛泽东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他以这一基本观点为指导，详细地考察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对中国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有一个比较深刻而全面的认识。毛泽东所说的文化，既不是指一般的文化知识，例如语文知识和教育程度而言，也不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行的文治和教化，而是范围更广、含义更深涵盖面更大的大文化。毛泽东把文化看成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